

对非发展援助与中国国际责任的当代实践

刘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作为一个有久远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根基的文明古国,一个日渐崛起的现代国家,当代中国的对非援助与履行国际责任带有明显的自主特色与东方大国的行为特征,它既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又紧紧服务于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追求民族国家复兴强盛的时代要求与战略目标,及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华民族时代使命感。文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讨论分析了当代中国对非援助与履行国际责任的民族实践及支撑这种实践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渊源,并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担当国际责任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对非援助; 国际责任; 中华文化; 民族实践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5)02-0001-10

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责任问题、关于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话题在国际上十分流行,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更是热衷于此,各种议论、猜测和指责可谓花样翻新,十分热闹。^[1]其实,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发展已经有数千年了,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交往早有漫长久远之历史。作为世界史上最古老且绵延迄今的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发展数千年而不衰,就在于它自古迄今就是一个群体意识、家国意识、天下意识、责任担当与忧患意识很重的民族。当代中国的对非援助及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合作正是整个中国漫长历史创造的一部分,是古老文明精神的现代延续。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忧患 责任意识与天下担当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群体利益与天下安

危的古老民族。中国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也知道“独木难成林”之道理,因而一直主张在“人我之间”、“家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互利的关系结构,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之基本准则。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一样。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能生存和发展,必得与他国他族有往来,有合作,在互利合作中寻求自我发展,努力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自利与利他相平衡的新型国际关系。而实施对外援助与担当国际责任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国一族与他国他族交往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基本关系形态。^[3]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知识传统与世界视野的国家。早在上古之时,在自身文明视域所及之范围内,中国的先贤们就形成了一种开阔高远的古人称之为“天下”的济世情怀,一种超越个体生命之小我而形成“民,吾同

收稿日期: 2015-01-18

作者简介: 刘鸿武(1958-),男,云南西双版纳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重点规划项目“未来10年大国在非洲的战略博弈与中国非洲学的建构及使命”(2013GH001)

胞;物,吾与也”之大同理想。^①这其中的宽广、担当与远大,从根本上支撑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生存与发展。

在千百年治乱相因、盛衰更替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先贤圣哲始终在思考国泰民安之策,在探究太平盛世之举。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生成了一种“推己及人和推己及物”的普世情怀,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担当天下”的责任文化。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4]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始终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5]的处世原则,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6]的家国信念与责任意识,超越个体生命之“小我”而上下求索,努力去完成“立功、立德、立言”之人生使命,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由此而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关于“自度与度人”、“自立与济世”、“个人与国家”、“责任与权利”、“中华与世界”之种种关系维度如何处理与理想状况如何达致的思想智慧和知识传统。这些丰富的思想智慧,精深的知识传统,实为支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风霜雨雪而不衰、经无数磨砺考验而永固的精神根基与民族精神。^[8]

深刻洞习和准确把握国家民族治乱兴衰之缘由,并有强烈的担当情怀与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止的内在精神动力所在。早在两三千多年前,中华先贤们就开始系统思考国家民族治乱兴衰之根源及每一代人所应担当之责任。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9]⁴³⁰为取鉴以经世,疏通以知远,一代又一代中华先贤们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上下探索千年文明演进之规律,更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责任意识与生命信念,探寻家国民族兴亡之运,盛衰之迹,从而“垂鉴戒,定褒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顺应历史潮流的基础上担当人生责任,开创国家民族之繁荣盛世。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先贤们以高远的天下情怀与责任意识,努力去“观乎天文、察乎时变”,将数千年沧桑往事与岁月沉积通贯于眼前而观之,将过往之一切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总结升华成为种种关于“变易通久”、“自强不息”、“多难兴邦”、“厚德载物”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奋斗精神,并因此而去安邦治国,经世济民,去创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而“上无愧于天,下无憾于地,外无负于人,内无疚于己”。^[10]“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正是一种“青山与我长在,江河并我共流”的中华民族传承久远的担当情怀与责任意识。

进入近代后,在西欧一隅之地率先兴起而向现代社会加速发展的二三百年来,中国一度闭关锁国,隔绝沉沦,乃至落后于世而为西方列强欺凌,甚至遭东亚近邻日本铁蹄入侵劫掠,国运之衰可谓千古未有。但是,国人终能“知耻而后勇”,以史为鉴,痛改前非,几代中国人奋力变革图新,放眼全球而追逐先进,终得复兴崛起,巍巍然再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成一世界性大国。近代以来中华先贤的此种复兴国家民族的担当情怀、责任意识、自强精神,自可光大于世而成为今日国人走向世界、履行担当中华民族济世利他之国际责任的坚定信念与精神动力。

二、中华责任文化传统的 现代国际实践及其创新意义

当代中国对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与发展事业的积极支持、援助与合作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②从全球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六十多年,全球体系结构及其国家间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与调整中,各国以援助为对外交往的特殊工具和手段而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形成独特的交往关系,一直是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与内容之一。^③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是随着现代国际体系诞生而形成的,而现代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以主权国家间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形成,是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产生的两大基础。^④中华民族参与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国际援助体系,是一个逐渐认知、推演与拓展的过程。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在追求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过程中,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站

在新的时代起点与全球视野上,来思考中华民族在复兴自我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如何在自存与共存、援他与助我、利己与互惠之间寻求适当平衡,努力承担起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责任,对人类现代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1]

早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曾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12]而后又明确告戒后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抵抗精神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救亡图存之时,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也曾说过“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1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明确表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两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4]他还说,中国人口已达到6亿多、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大国,“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1963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5]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中国领导人曾对援助的战略意义与目标有过相应的思考,“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

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16]为此,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对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说,我们援助非洲其实就是援助我们自己。^[17]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与国力的增强,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体系及中国经济规模与总量的上升,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互动依存关系,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关系的结构与性质也在明显的变化与调整之中。一方面,中国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会与普遍利益;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在市场、技术、资源、能源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也在明显加深,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合作及竞争的规模与领域也在持续扩大。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和平与发展问题,气候、环境与生态问题,各种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的生存挑战,需要共同应对担当。

中国的国际社会责任问题,就是在此背景下于近些年来重新被世人和中国人自己所关注和热议的。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中国从一个受援国转变成为一个援助国,期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广泛、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履行更广泛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及在世界和平建设、安全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及环境生态保护等领域,中国都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18]可以说,无论是客观情势还是主观意愿,中国自身对世界的影响与作用已经空前地获得了提升。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责任的准确内涵及其合理度量

然而,对于中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

和义务,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承担国际责任,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的要求与期待却很不一样。在一些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责任就是在国内推行西式政治改革,建立西式民主与政治制度,遵循西方的人权、良治、环保、劳工等方面的标准,实施彻底的自由化市场经济制度,在国际上则应遵守和维护西方主导的现有秩序与规则,尊重西方在亚非拉世界的既得利益与优势地位,并以西方要求的行为方式与观念形态,参与和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与援助模式,等等。从总体上说,西方概念或语境下的“中国责任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如何约束中国、改造中国,让中国按西方习惯和认可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问题,这其实是要求中国向西方负责,维护西方之利益与特权。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国际责任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希望携手中国,借助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期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代表其政治经济利益,增加发展援助,扩大对外投资,促进共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亚非拉经济合作关系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增长迅速,在一些领域,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当地企业与百姓形成了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态势,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有上升的趋势。一方面,随着这些国家自主发展意识、资源保护与权益意识的增长,其对中国的要求与期待也出现新的变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会越来越多地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提升援助层次,增加拉动当地税收和就业机会的投资,增加当地资源开采的产业链与附加值,在投资贸易中更多考虑当地百姓的利益,让利于当地,多做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还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减少劳工输出,加快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的本地化进程,雇佣更多当地员工为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提高当地劳工待遇,增加教育与人力资源培训,更重视当地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对于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国际责任的种种要求与期待,中国必须做出谨慎周全的判断与回应,仔细辨析其用意及中国之可为与能为。如果处理不

好,应对失当,担当了中国不应该担当的责任,就可能是一种抑制中国自我发展的阻力,一种不可承受的巨大负担,致使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皆不满意。但如果处理得当,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发挥好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也可能是促使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发展、提升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的动力与机遇,从而改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19]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有久远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根基的文明古国,一个发展中的现代国家以及逐渐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经济体,当代中国的对非援助与国际责任的履行,必然带有明显的自主特色与东方大国的行为特征。总体上说,中国对非援助与国际责任,既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又紧紧服务于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追求民族国家复兴强盛的时代要求与战略目标。因而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履行国际责任,应该大体符合如下原则。第一,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事务。第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不能超出自身的能力,不做超出国力和力不能及的事。第三,中国不回避应尽的国际义务,但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是为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服务,而是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对未来负责。第四,随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增强,中国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对国际援助和责任的看法,常常是矛盾的、情绪化的,有时甚至是戏剧性的。有时他们指责中国对外援助太少,指责中国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有时又指责中国援助太多,将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夸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由此暗中指责中国国际野心太大,且不顾国内民生疾苦。许多时候他们也指责中国的援助不按规矩行事,我行我素,自搞一套,破坏了西方在亚非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推进人权事业和实施良政的努力,是整个国际社会中不负责任的“另类”。事实上,对西方来说,首要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大小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多

寡,而是中国是否按照西方的标准与要求去做,会不会成为与西方模式不一样的“另类”。^⑤在西方的强大话语攻击下,中国国内也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出现,有的人批评中国四处撒钱,根据西方数字批评中国“五年豪砸五千亿”,^[20]有的人批评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的对外援助只搞工程项目,形式单一且不重视发展援助,并认为中国不应该自外于西方模式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更有人直接主张中国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西方社会接轨,按照西方的援助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援助体制机制。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曾于2013年发表一份有关中国经济和对外援助的报告,称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从2002年的5000万美元,迅速膨胀到2007年的2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总计达4708亿元人民币,称这五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经费突然增长了50倍。这份报告引起国内外许多人的关注,来自国内外的捧杀与指责之声四起。然而这份关于中国援助经费的估算报告是很不可信的。事实上,2002年中国的援外经费既不像这份报告中说的只有5000万美元这么少,根据相关数据,当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约为62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约8亿多美元。同样,2007年中国的外援经费也没有这份报告中说的猛增到250亿美元这么多,根据中国商务部、财政部相关数据,2007年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约为173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约20亿美元,距这份报告说的250亿美元相去甚远。事实上,由二十多个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对非援助在2006年达到高峰时的援助总额也只有260亿美元,中国一个国家不可能在2007年一年的对非援助就高达250亿美元。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在逐渐增长,但即便到2012年,中国当年的对外援助总额也仅为298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也不到50亿美元。^⑥在长期研究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的美国学者黛博拉看来,中国对外援助远没有西方宣称的那么多,她认为中国对非官方发展援助2008年约为10亿美

元,2009年增长到约14亿美元,并认为中国对非援助的最大特点是“承诺少、兑现多”,而西方却是承诺多、兑现少。^[21]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经费由三部分构成,即无偿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三部分。国外一些机构之所以往往将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大大高估,是因为将许多以商业贷款实施的中外合作与投资项目也列为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根据中国政府2011年7月首次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从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底,中国累计提供对外援助金额2562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资金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亿元,优惠贷款735亿元。2007年中国对外援助的173亿人民币中,由国家财政安排约112亿,其余60多亿优惠贷款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安排。又如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约298亿人民币,其中财政安排167亿,进出口银行安排约131亿。^⑦201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未来三年(2013-2015)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约折合1300亿元人民币。这20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农业、科技、卫生、教育、环境、新能源及其他经济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发展,它具有突出的发展援助的性质,但也并非是单纯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

总体上说,中国有自己的对于对外援助及履行国际责任的理解与期待,而这种理解与期待,其实是与中国对于自我、对于时代、对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核心问题的基本判断直接相关联的。

四、当代人类发展问题之 解决与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

新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现代援助关系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亚非拉落后国家为追求各自的国家复兴与民族自强而在外交领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22]以中非关系为例,近代中国国运沉沦衰败,任由外人欺凌鱼肉,已无自主外交空间可言,而非洲大陆之情形,亦与中国相仿而尤甚之。但新中国的建立与非洲大陆的解

放,使双方改变这一状态的梦想成为可能。当时,中非双方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发现了对方。^[23]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9]^[24]这两个自近代以来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世界,在初步接触之后便发现,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平等待我之民族,有真诚助我之国家。^[24]这是当代中非相互援助与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最初的基础与动力所在。

对于这一关系的性质、意义与作用,中国和亚非领导人都曾做过自己独特的思考。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 k Nyerere)曾这样说: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重,非洲惟有结为一体,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但非洲仅有内部团结不够,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25]他说“无论是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26]正如时任非盟轮执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在2006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所说,“中国奉行国家间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使非洲有机会与之建立以互信为基础的伙伴关系。50年前,我们在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充分行使主权的斗争中,开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50年后,我们再次重申中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他还说,“非洲人民对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抱有很高期望,我们的人民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从中深受启发”。^[27]

中非关系建立之初,“对外援助”这一概念已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核心内容。不过,对于对非援助的性质与意义,中国始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1964年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非洲10国期间,首次向世人宣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17]这些原则的提出及实施,表明中国政府一开始就试图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在中非关系建立之初便成为

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援建坦赞铁路是当代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历史性举措。为建设这条全长1860公里的铁路,中国政府投入的资金达4.55亿美元,可谓举全国之力为之。^①周恩来曾指出,“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28]坦赞铁路的兴建鼓励了非洲人民的斗志,促进了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而铁路建成后,中国没有利用坦赞铁路运回一吨非洲的铜矿,^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于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无私援助与国际主义责任。^[25]

当时,中国已经将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对人类应尽的国际责任,是应该担当的国际责任,毛泽东曾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核心思想,并分析了三个世界的关系及前途。他认为亚非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问题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他曾对卡翁达总统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29]

总体上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一种富国对穷国的、高高在上者对落后者的单向度的捐赠与施舍,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则是一种第三世界人民帮第三世界人民的平等的双向度的相互援助与支持,旨在推进自身和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事业。西方曾将对不发达国家的不情愿的援助视为一种“白人的负担”,继而又以为通过援助则可以彰显西方国家的制度优势与道德高地,同时还可以附加上种种条件,要受援国追随于西方之制度与文化而改变自身。但这种外部支配性的援助,即便出自良好愿望,却也可能背离不发达国家的国情民状而未必能在推进受援国的发展方面达到理想的目标。

中国也有自身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传统理念与

基本原则。在与他国他族交往的关系结构上,如果说“独善其身”是中国人的基本人格底线,那么“兼济天下”则是中国人的高远理想目标。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发展问题之解决的角度上说,当代中国要承担的最大国际责任,首先是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不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负担,成为世界动荡的源头。中国本身首先必须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治理好了自己的社会,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就相当于解决了全球 1/4 人类的发展问题,就是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完成了一份巨大的国际责任。^[30]同时,在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丰富实践及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机会,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中国过去 30 多年对于世界所承担的一份特殊的责任。

今天,中国正努力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将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2013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国致力于把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非洲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机遇同非洲发展机遇紧密融合起来”。他还指出,“13 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 亿多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31]中国领导人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及将“中国梦”与“非洲梦”结合起来的这种观念,准确表述了中国政府对于中非关系基本态势与未来走向的看法与期待,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评价与热烈响应。^⑨长远来看,这样一种跨越大洋的以共同发展为核心使命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这样一种把“中国机遇”与“非洲机遇”乃至“世界机遇”融通起来的开阔心胸与包容战略,将必然能够发展出一种更高层次更具战略意义的推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从根本上迎接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

挑战,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全球的平衡发展”。

五、中国因素已日益成为推动非洲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

通过实现自我发展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通过对外援助来推进中国自身与亚非世界的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出发点与战略目标,也是当代中国“兼济天下”履行现代国际责任的基本路径与基本方式。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中国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对非援助与合作理念及体制机制,中非关系也成为当代中国外交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2006 年 1 月,中国公布《中国对非政策文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首次正式颁布的外交政策文件。这份文件公开表明了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目标、政策与措施,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的利益追求与行动方式。2011 年 4 月,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布《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随后又在 2014 年再次公布相应文件。中国正式公布对非政策文件和对非援助白皮书这些举措本身,反映出中国对外援助日趋走向公开、透明、成熟,体现出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和理性。

中非合作日益成为非洲变革的动力与活力,成为推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对中国在非洲所起作用的一个基本评价与判断,也是谈论中国在非洲的责任问题时必须有的基本共识。过去十多年,通过中非之间日益拓展的实质性发展合作,来自中国的援助、贸易、投资合作,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源培训,对非洲国家保持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在过去十年非洲大陆年均约 5% - 6% 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的贡献率约占到了 1/3,即在 21 世纪头十年中,非洲经济增长的 1/3 是由来自中国的援助、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合作等“中国因素”促进的。^[32]即使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过去十多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将是长远的,因为中国“仅用了 10 年的时间,在努力达到自己目标的同时也为非洲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未来。事实上,它把

一个偏移正轨的大陆又拉了回来,它让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被遗忘的大陆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于是中国便完成了一项主要任务,那就是非洲无论在本地人还是在外人眼中都变得真正有价值”。^[33]南非标准银行经济学家杰里米·斯蒂文斯(Jeremy Stevens)认为,“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非洲大陆每年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资金短缺就达1 000多亿美元,而从2007年开始,中国为非洲2/3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已成为非洲关键的合作伙伴,他还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成功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非洲。然而,非洲的改变才刚刚起步,而中国和非洲的商业纽带也一样,以后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34]

长期以来,一些非洲国家能力缺失与政府行政绩效低下,一直是一个制约非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也是非洲国家关注中国且期望从中有所借鉴的领域。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中非在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方面展开交流,在国家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合作,是中非合作实践务实与创新原则的具体表现。此外,在处理多民族国家之复杂民族关系、宗教关系、边疆地方发展问题方面,中国与非洲国家也可以开展交流借鉴。^[35]而中国自身也从与非洲经济贸易合作的过程中,找到了进入世界市场和提升国际适应能力的机会。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而带动中非双方的互利发展,正显示中非合作的特殊意义。^[36]

最近十多年,发展中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2008年4月11日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显示,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崛起,其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36%上升至2008年的41%。过去30年(1978-2007),中非年贸易额由7亿多美元增长到730多亿美元,增长了100倍;2000年到2007年,非洲对亚洲的出口占其出口比重由14%上升到28%,非洲与亚洲间的经济关系正迅速加强和提升。同时,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来自亚太、南亚、拉美、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能源、矿产、农业、金融、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对非合作日益扩大,对非洲的资源、市场、劳

动力、土地的需求日见强烈,提升了非洲资源的国际竞争平台,延长了非洲发展要素的价值链,这是非洲经济的“新曙光”。^[37]

今天,在追求民族复兴与走向世界的征途中,中国再次来到了“自强”与“济世”互为支撑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另一新时代起点上。古人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谋百年者,亦不足以谋一时”,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与合作就是中国要谋百年之大业,担千秋之使命。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与合作作为当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基本形态,作为当代中国追求国家民族复兴与世界和谐发展的特殊努力,虽然数十年来经历了种种变化与调整,但其中那不变的内核理念与情怀,其实是深藏在中国数千年来积淀而形成的民族精神大道之中的,它决非一日之计,一时之功,而是中华民族现代复兴过程中必有之义,必经之途。

注释:

- ①张载“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见《张载集·西铭篇》。
- ②Liu Hongwu, Yang Jiemin. Fifty Years of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Background, Progress and Significanc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Sino-African Relations.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正如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其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的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中指出的,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组织援助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不同既体现在内容方面,又体现在援助活动的标准方面”。在她看来,“中国是截然不同的捐助者和战略伙伴。因为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作为一个在近期拥有类似经历的伙伴。中国在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功(比如说中国在快速经济转型和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功)使它具有了很大程度的可信性”。Brautigam D.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 ③在当代世界的援助体系中,西方国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国际援助理念与政策、援助手段与标准,也多由西方国家制定和掌控。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世界各国对援助的动因各有不同,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人道主义需要。对受援国面临的各种自然与人为的灾难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与救助。第二,国家外交与战略的需要。受援助国对本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通过援助可以加强对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提升本国在国际战略竞争中的地位与实力。第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通过援助可以推进本国的经济利益的拓展与合作空间。虽然受援助的国家经济十分落后,从当下看援助成为发

达国家单方面的付出,但受援国往往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前景,因而援助可以让施助者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第四,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共通性与相似性。通过援助可以扩大援助者在国际上的战略盟友,巩固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方面具有共同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五,地域政治的考虑,等等。参见 Schraeder P J, Hook S W, Taylor B. Clarifying the Foreign Aid Puzzle: 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Japanese, French, and Swedish Aid Flows. *World Politics*, 1998, 50(2): 294-323.

- ④ 本文中使用的“主权国家”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具有内涵与外延的同构性与互换性。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国家形成与维持的核心,而这里的“民族国家”的“民族”,是指构成这一国家的全体民众共同组成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共同体,相当于“国族”,如“中华民族”既是以“中国”这一主权国家为基础形成的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国族”,正如“中国人”之相对于“美国人”、“尼日利亚人”一样,是以国家为范畴的“国家民族”,他们在一国之内共享不可分割之国家主权,因而也可称“民族国家”为“主权国家”。
- ⑤ 余南平《中国对外援助不应再由商务部主导》,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3 年 7 月 1 日,见: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164?full=y>。这篇文章对中国援助体制改革问题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他引用的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关于 2002 年到 2007 年中国外援达 4 700 多亿人民币的数字并不可信,此外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只做传统的工程项目而不重视发展援助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
- ⑥ 相关数据根据中国国家商务部、财政部当年公布的相关数字整理而成。
- ⑦ 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是耗资 9 亿元人民币(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 1.5:1),刘贵今大使在南非安全研究所上的演讲,中非合作论坛网: <http://www.focac.org/chn/zyl/hywj/t280368.htm>。
- ⑧ 近年一些西方媒体将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时奉行“不干涉原则”称作是唯利是图的重商主义政策,显然是对中非关系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
- ⑨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 2013 年 7 月 23 日在中国的一个演讲中说“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个中国梦,那么整个非洲也需要一个非洲梦,每一个非洲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梦。这也是非洲应该向中国学习和吸取的另外一个经验。中国一定会希望非洲成功,非洲也一定希望中国成功。我们双方的福祉对彼此以及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坦桑尼亚前外长阿莎罗斯·米吉罗 2013 年 7 月 18 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梦与非洲梦:实现共同发展》的演讲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中国梦强调追求共同发展的愿景,与非洲梦有共鸣之处,在非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见中非合作论坛网: <http://www.focac.org/chn/zxxx/t1069920.htm>。

参考文献:

- [1]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EB/OL]. [2014-12-20].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65.
- [3] 刘鸿武. 非洲发展大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 国际问题研究, 2013(2): 72-87.
- [4] 古诗十九首集释[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70.
- [5] 鲁国光, 马智强. 孟子注评[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232-233.
- [6] 顾炎武. 日知录·正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298.
- [7] 张载. 张载集[M]. 章锡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320.
- [8] 刘鸿武. 故乡回归之路——大学人文科学教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7.
- [9] 高亨. 诗经今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0] 刘鸿武. 文史哲与人生[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66.
- [11] Liu Hongwu.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Reshaping of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J].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5): 38-47.
- [12]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691.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28.
- [1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57.
- [15] 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N]. 人民日报, 1963-08-09(1).
- [16]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1964-12-31(1).
- [17] 周恩来发表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EB/OL]. [2009-03-18]. http://www.china.com.cn/fangtan/zhuanti/2009-03/18/content_17464417.htm.
- [18] 刘鸿武, 罗建波. 中非发展合作: 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
- [19] 刘鸿武. 非洲机遇与中国的“全球再平衡战略”[N]. 东方早报, 2013-03-27(A18).
- [20] 中国式援助: 五年豪砸五千亿[EB/OL]. [2012-05-28]. <http://data.163.com/12/0528/05/82101S2000014MTN.html>.
- [21] Brautigam D.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0.
- [22] 刘鸿武. 中非关系 30 年: 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支点[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11): 80-88.
- [23] Larkin B D.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

- [24]刘鸿武. 跨越大洋的遥远呼应——中非两大文明之历史认知与现实合作[J]. 国际政治研究, 2007(4): 32-41.
- [25]J k Nyerere. South-South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N]. Uhuru (Dar es Salaam),1979-05-23(1) .
- [26]尼雷尔总统在季先念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85-08-20(3) .
- [27]梅莱斯总理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06-11-06(2) .
- [28]尹家民. 援建坦赞铁路内幕[J]. 党史博览, 1999(12) : 7-11.
- [29]吕正操. 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J]. 纵横, 1998(1) : 19-20.
- [30]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N]. 人民日报, 2006-03-15(1) .
- [31]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EB/OL]. [2013-06-20]. <http://www.focac.org/chn/zt/1/t1025142.htm>.
- [32]张宏明, 张永蓬. 中国与西方国家对非援助比较及我国援外(援非) 国际合作战略[R]//外交部非洲司. 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2011 年课题研究报告选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 2012: 86.
- [33]塞尔·米歇尔. 中国的非洲: 中国正在征服黑色大陆[M]. 孙中旭,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204.
- [34]陈思敏. 南非媒体: 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EB/OL]. [2011-07-14]. 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107/24/t20110724_22560708.shtml.
- [35]刘鸿武. 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 会通与综合——关于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探索[J]. 思想战线, 1998(1) : 49-54.
- [36]Liu Hongwu. How to Solve African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ssues?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B/OL]. [2013-09-09]. <http://ic-tsd.org/i/news/bridges-africa-review/175593/#respond>.
- [37]Akamolafe F. No One is Laughing at the Asians anymore [J]. New African, 2006(452) : 48-50.

China's Development Aid to Africa and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LIU Hongwu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China, a country with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s. Now it is on the rise to a modern country.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aid to Africa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obvious independence and behavioral feature of an eastern powerful country. In fact, China's aid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anci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national spirit, and serves for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which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country's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Besides, this kind of aid also comes from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sense of mission to promote th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spirit, this paper analyses China's development aid to Africa and the national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sis of these n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aid to Africa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aid to Africa;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Chinese culture; national practice

(责任编辑 吴月芽)